

# 制造业重构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地理研究转向

朱晟君, 王 翀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改革开放诱发了以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为特征的首轮制造业重构,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快速发展, 尤其在中国沿海地区形成大量外向型产业集聚, 并由此构成“旧”经济地理格局。进入21世纪, “旧”经济地理格局的弊端凸显, 加上外部变化的冲击, 催动了以“向上走”、“向西走”和“走出去”为主的第二轮产业重构, 全球化、区域化和地方化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新”经济地理格局。制造业地理格局的剧变使得中国经济地理相关研究亦发生巨大转向, 重心逐渐从关注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过渡到产业升级、转移和去地方化等要点。中国相关研究不仅验证西方经典理论, 同时对改进西方理论亦有重大贡献, 尤其在对制度政策、国内市场、中国企业的能动性在产业重构中的作用等方面极大弥补了经典经济地理学的缺陷。本文最后还就经典理论的整合和研究方法的普适性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 键 词:**制造业; 产业重构; 经济地理格局; 中国

##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 1978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6%。改革开放主要从以下三方面重塑了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 (McMillan et al, 1992; Wei, 2000, 2001; He et al, 2008): ①市场化, 即在原有的公有和集体经济体制中引入非公有经济, 更加注重经济的市场导向; ②全球化, 即整个经济体系从封闭逐渐开放, 并以出口导向为主要发展模式主动融入全球经济; ③分权化, 即中央政府下放部分权利给地方政府。改革开放恰逢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阶段, 推动着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 (Gereffi, 2009; Henderson et al, 2011; 许德友, 2011; 刘志高等, 2014)。

改革开放初期, 凭借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等 (王缉慈等, 2007; Gereffi, 2009; 罗胤晨

等, 2014) 以及宽松的进出口检验标准、不健全的劳动和法规、外资的优惠政策等制度性因素 (金煜等, 2006; 吴彦艳等, 2008), 中国外向型制造业快速发展, 并在沿海地区形成了生产活动与就业相对集中的出口加工贸易区 (Fujita et al, 2001; Wen, 2004; He et al, 2008), 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壮大 (金煜等, 2006; 王缉慈等, 2007)。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 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进一步促进了外向型制造业的发展。在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模式驱动下, 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出口增长率约为12.4%, 个别年份甚至超出20%。

然而, 进入21世纪后, 上述工业化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 加上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的外部冲击, 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外向型制造业发展模式及其地理空间组织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 (Yang, 2012; Zhu, Pickles, 2014)。首先, 最为重要的廉价劳动力和人口红利优势正在削弱。劳动力追求更

收稿日期: 2017-12-20; 修订日期: 2018-03-0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7011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项目 (4142500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41731278)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701115; National Science Fund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 No.41425001; Key Project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731278]。

作者简介: 朱晟君 (1984-), 男, 安徽淮北人, 研究员, 博导,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升级、全球化与区域发展, E-mail: zhushu@pku.edu.cn。

引用格式: 朱晟君, 王翀. 2018. 制造业重构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地理研究转向[J]. 地理科学进展, 37(7): 865-879. [Zhu S J, Wang C. 2018. Shifts in China's economic geography studies in an era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7(7): 865-879.]. DOI: 10.18306/dlkxjz.2018.07.001

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环境使得沿海地区劳动雇佣成本上升,出现相对的劳动力短缺,导致生产成本上升(Yang, 2012; Zhu, Pickles, 2014; 阳立高等, 2014; 阳立高等, 2015)。其次,人民币升值和投入要素成本增加等外部冲击也在挤压外向型制造业的利润空间(胡宗义等, 2010; Liao et al, 2011; Yang, 2012; 李新功, 2017; 刘明等, 2017)。最后,中国环境与劳动法规逐渐完善,政策导向明显转变。2008年发布的新劳动法拓展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范围,2015年实施的新环保法加强了对环境的保护及执行力度,间接推高了生产成本,对劳动密集、污染严重的沿海地区冲击尤甚(Zhu, He et al, 2014)。中国政府为协调区域发展,摆脱低端产业所带来的弊端,也采取了转移与退出低端产业的改革策略。以上种种因素促使制造业再次重构,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明显减小,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的变迁(张韵君等, 2009; Zhu et al, 2013)。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以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为主的第一轮产业重构促使中国外向型制造业快速发展,并在沿海地区形成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集群,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Wen, 2004; He et al, 2008; 贺灿飞等, 2011)。而2000年之后,外向型制造业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巨大冲击,触发了第二轮制造业重构。因此,为了解释中国制造业及其在全球和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变化动态,相关研究也在不断探索与转变(Liao et al, 2011; Yang, 2012; Zhu, Pickles, 2014)。本文以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重构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一轮产业重构下的“旧”经济地理格局及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2000年后的“新”经济地理格局,以及国内外相关的理论分析框架。

## 2 “旧”经济地理格局:制度变迁、经济转型与首轮产业重构

North(1990)提出,经济与政治制度是影响区域内的公司地理格局、经济效益、创业活动等方面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中的经济活动空间特征主要受到市场、区域关系和贸易自由度的影响。但在中国的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制度与政策环境的时空差异显著且影响深刻,使得就业、生产等地理活动和产业发展过程更加复杂。

改革开放后,在一系列制度政策的带动下,以国家为主体的中央计划经济逐渐转变为以市场导向为主的经济体制(McMillan et al, 1992; 贾国雄, 2014),这一转折从三方面改变了经济地理格局(He et al, 2016):市场化减少了要素流动的限制,全球化增强了沿海地区吸引外资的区位优势并推动了出口贸易水平的上升,分权化引发了地方保护与区域竞争。这三方面是第一轮产业重构的重要特征,从不同角度塑造了第一轮产业重构的经济格局。

### 2.1 市场化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主导转变为市场经济主导,非公有经济比重逐渐扩大,市场竞争日益加剧(McMillan et al, 1992; 贾国雄, 2014)。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以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国家政治、社会 and 军事决策极大影响了企业发展模式和方向,进而影响了当时的制造业地理格局(Ma et al, 1997)。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逐渐放开对私有企业发展的限制,提倡企业家精神(Chang et al, 1991),非国有企业尤其是私有企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愈发重要(田川, 2009; 贾国雄, 2014)。市场化减少了对要素流动的限制。为了减少物流成本,各个企业利用比较优势,寻找合适的上下游企业共同选址,形成了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尤其是在中国的沿海地区更加明显。同时为了发展出口贸易,政府利用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开放的历史人文因素,将其设为优先开放区并出台了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吸引跨国公司与本地制造企业在沿海地区投资建厂,进一步促进了制造业在该区域集聚(刘乃全等, 2008; 罗胤晨等, 2014)。因此,沿海地区最先从市场化中受益,原本分散的制造业,尤其是外向型出口制造业,快速向沿海地区转移,形成了劳动力密集的出口加工区(Fujita et al, 2001; 蒋涛等, 2007; 刘乃全等, 2008)。

市场化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一方面,不同产业的国有和私有经济比例不同。改革初期,国家鼓励私有企业进入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减少了该类行业中的国有资产比重(Wei, 2001)。但是在烟草和石油加工等资本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中,国有资产仍占有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结构与生产结构具有一定差异性。由于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政府出台优惠贸易政策,促进了劳动

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但是产业政策更加鼓励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也在不断增加(尹翔硕,1997)。

## 2.2 全球化

改革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开放则推动了中国经 济全球化的进程,助力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金融资本和先进的技术、知识、管理手段以及高质量投入要素(Wei, 2000; He et al, 2008)。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成长发展的途径包括两方面:一是本土企业向跨国企业学习,这些跨国企业主要以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驻中国的外资企业为主;二是中国企业加入了全球生产网络,与国外龙头企业结成跨区域联系(Gereffi, 2009)。

此外,由于沿海地区的地理位置利于出口贸易,因此全球化也推动了产业向沿海地区的集聚。为了利用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优惠政策,跨国企业通常会在中国沿海地区直接投资,其中以经济特区为主(Head et al, 1996; Wei, 2000; 吕卫国等, 2012)。为了进入国际市场并减少出口物流成本,本土外向型制造业也向沿海地区集中(Fujita et al, 2001)。因此,在外部经济、集聚效应和市场优势的推动下,以外向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集聚不断发展,极大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和能力(许德友, 梁琦, 2011; 吕卫国等, 2012; 林桂军等, 2015)。

## 2.3 分权化

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逐渐将部分财政和政策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为经济规划、发展与决策的主导者,作为“有形的手”调控经济(Wei, 2001; He et al, 2008)。地方分权从两方面影响首轮产业重构的经济地理格局:一方面,相比于落后的内陆地区,沿海地区的政府更有能力提供经济补贴、技术支持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从而吸引本土企业与外商进入,加强了沿海地区的产业集中程度;另一方面,经济决策权与财政权下放到地方,引发了地方保护主义和激烈的区域竞争(Zhao et al, 1999; Bai et al, 2004)。由于某些国有资产比例较高的产业拥有显著的资源优势或规模经济,能为地方政府带来丰厚的税前利润,因此,地方政府通常将这些产业看做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实施了一系列产业保护措施(Zhao et al, 1999; Bai et al, 2004; 贺灿飞等, 2010)。为了打造产业集群从而提升政绩,地方政府对一些产业链长、产业联系广泛

的产业也尤为偏爱(贺灿飞等, 2007; 贺灿飞等, 2011)。因此,政府对地方经济的主导作用导致某些产业分布在各个不同地区,分散化特征明显。

## 2.4 小结

中国制造业首轮产业重构的相关研究借用西方经典的经济地理学理论,如产业集群和产业集聚等来透析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制造业地理格局的变迁。在验证西方经典理论的同时,中国相关研究也挑战和丰富了发源于西方经验的“主流”经济地理理论。由于西方理论多基于西方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产业格局总结得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市场经济并非是主导要素空间分布的唯一因素,中国政府和制度环境的作用不可忽视。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中国的制度存在巨大空间差异,市场化、全球化、分权化改革也是渐进式的。因此,对产业格局影响巨大的制度环境呈现出破碎化、动态化、多样化的景观。上述众多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较好地强调了政府和制度环境在产业集聚和分散过程中起到的复杂作用,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西方经典的经济地理理论。

# 3 “新”经济地理格局:升级、转型与第二轮产业重构

## 3.1 第二轮产业重构

### 3.1.1 首轮产业重构的弊端与挑战

2000年后,制造业沿着首轮产业重构的路径不断发展,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加上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挑战,中国迫切需要重新调整制造业的发展模式。首先,国内区域发展差距拉大,不同区域之间的内在联系较少,东南沿海地区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辐射和带动效应较弱(蒋涛等, 2007; 刘乃全等, 2008; 陈曦等, 2015)。其次,发达国家占据制造业产业链的高端位置,拥有技术领先优势,而中国制造业则长期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仍处在制造业的“低端领域”(邹昭晞, 2010)。相比于发达国家的 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以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为主体,单位工业增加值对应的污染物排放量与资源消耗量较大,环境污染问题严重(曹执令, 2013)。同时,随着中国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人口老龄化,劳动力雇佣成本增加,沿海地区的低成本劳动



力短缺,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消失,外向型制造业的发展受到挑战(金煜, 2006; 阳立高等, 2014)。为应对环境与劳动力问题,中国近年出台的新环境法和新劳动法进一步提升了制造业的环保与用工成本,制造业利润空间减小。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要素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全球市场需求放缓等外部挑战对中国外向型制造业产生了进一步的威胁(胡宗义等, 2010; 吕卫国等, 2012; Yang, 2012; 李新功, 2017; 刘明等, 2017)。中国政府已意识到制造业发展模式的弊端和外部挑战,也主动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因此,发展的弊端、内部的改革与外部挑战共同引发了制造业的第二轮产业重构(图1)。

### 3.1.2 第二轮产业重构

21世纪初,为了应对首轮产业重构的弊端与外部挑战,中国政府鼓励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业从沿海地区转移到内陆(Zhu, Pickles, 2014),进而释放沿海地区的空间和资源来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同时帮助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可把第二轮产业重构总结为三个叠加的过程,即产业升级(向上走)、区域化(向西走)、去地方化(走出去)。产业升级(向上走)指的是鼓励和推动中国制造业企业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企业,逐步从低技术生产转变至中高技术的生产、从低端升级至高端生产、从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进入中高附加值环节(Zhu et al, 2013; Yang, 2014b; Zhu, He et al, 2014; Butollo, 2015; Zhu et al, 2015)。区域化(向西走)则是将低端

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从沿海地区转移到用工和消费水平较低的内陆地区(Liao et al, 2011; Zhu et al, 2013; Butollo, 2015; Zhu et al, 2015; 原 嫒 等, 2015)。去地方化(走出去)指的是将低端制造业的生产转移或外包至东南亚、非洲、中东地区等生产成本较低的区域,从而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躲避贸易壁垒、并打入当地市场(Henderson et al, 2011; Azmeh et al, 2013; Zhu et al, 2013)。

如果说首轮产业重构是中国制造业逐步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那么第二轮产业重构则是中国制造业从全球化的边缘跃升到核心的过程。中国的外向型制造业正在从低技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低端”领域起飞,更深层地融入甚至主导全球和区域生产网络,实现产业升级;同时,将这些“低端”生产环节进行空间转移,形成产业的空间再布局。由于研发、设计和品牌自主权等核心竞争力与人力资源、知识网络的联系密切,很难进行空间转移,因此产业再布局主要转移生产过程中劳动密集的元素,从而降低生产成本(Evans et al, 2006; Scott, 2006)。虽然也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向西转移、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向东转移的趋势,但二者转移的普遍性远低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制造业再布局的主要对象(原 嫒 等, 2015)。为了分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既要分析其在制造业生产网络中的变化,也要剖析产业升级对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

与其他国家相似的产业重构过程相比,中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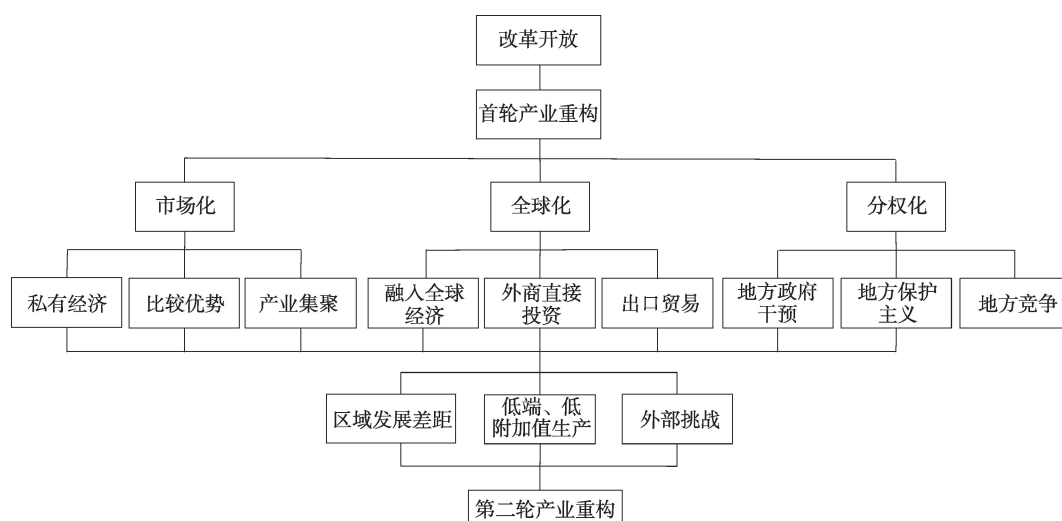


图1 首轮产业重构与第二轮产业重构的内在联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rst-round industri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second-round industrial reconstruction

产业重构更加复杂。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生产环节从欧洲和北美转移到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之后,再次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Evans et al, 2006)。如今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出现了相似的再布局过程(吴三忙等, 2010; Zhu, Pickles, 2014),但是中国的特殊之处为:首先,中国在全球、国家、区域生产链中进行了重新定位,并增加了区域化(向西走)的过程,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广阔的内陆地区;其次,中国制造商将生产环节外包的同时,也可将产品销售到巨大的国内市场(Zhu et al, 2013; Butollo, 2015; 聂飞等, 2015);再次,不同地区的知识溢出、社会网络、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社会习俗和制度政策等因素深刻影响着中国制造商升级与再布局的能力,并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机会与约束并存的动态环境(Storper, 1997; Pickles et al, 2006; 黄群慧等, 2015)。因此,需要从多样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与再布局过程,从而理解随之形成的新经济地理格局。

### 3.2 全球化、区域化与地方化

虽然中国政府采取了产业调整措施,但尚不能把第二轮产业重构的过程理解为产业升级(向上走)、区域化(向西走)、去地方化(走出去)的简单叠加。第二轮产业重构是全球化、区域化与地方化等多个过程综合影响与平衡的结果,其内在机制不容忽视。

#### 3.2.1 全球化

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与产业升级的意义(Gereffi, 2009; Wei, 2009, 2010; 姚志毅等, 2011; Zhu et al, 2013; Chen, 2014; Zhu et al, 2015; 刘仕国等, 2015; 盛斌等, 2015; 张鹏等, 2016)。由于中国的经济全球化,产业升级并不是简单地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演变,也不仅仅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是在生产网络和价值链中从低端到高端、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的跃升(姚志毅等, 2011)。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制造商大多是跨国公司的供应商,通过加入全球经济引入新知识,或通过进口将新知识扩散到相关企业乃至整个行业,助推中国制造业获得新产能并提升竞争力(Gereffi et al, 2005; Gereffi, 2009; 刘仕国等, 2015);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产业升级也可以看作是本土生产企业与国际

上相似企业的战略耦合过程(Coe et al, 2008; Coe, 2011)。然而,产业升级存在“结构锁定效应”,即中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容易沿着风险和不确定性较小的路径升级,主要是过程和产品升级,从而处于被跨国公司“俘获”的状态。如果中国制造业企业对附加值提升余地较大的半成品加工贸易进行升级(邱斌等, 2012),会受到上游产业技术转移和行业生产能力的限制(姚志毅等, 2011),因此,必须发挥资本设备升级与研发的推动作用来实现持续升级(邱斌等, 2012; 张鹏等, 2016)。2000-2010年间,随着劳动力成本和竞争压力不断攀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尤其是沿海区域的企业,为维持和提升企业竞争力,必须不断淘汰低附加值产品,沿全球价值链攀升。在此背景下,产业升级成为塑造中国制造业经济地理形态的重要因素(Yang, 2012; Zhu, Pickles, 2014)。所以,需要特别关注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提升附加值,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成功升级(Wei, 2010; Zhu et al, 2013; Chen, 2014; Zhu et al, 2015)。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制造业企业仍主要位于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低端环节,多依附于处于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跨国公司的角色加入全球经济中(唐海燕, 2013; 岑丽君, 2015)。因此,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占据主导位置,把持着进入世界经济和欧美消费市场的大门,其决策对全球经济的经济地理格局影响重大,并决定着中国制造业企业是否可以进入世界舞台。中国制造业企业和供货商处在弱势位置,其发展方向和决策独立性较低,受到跨国公司的影响。近期,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跨国公司纷纷要求中国制造业企业把低端生产工作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为低廉的区域(Zhu et al, 2013; Zhu et al, 2015)。某种程度上,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内陆或其他国家拥有大型制造基地,已成为进入全球生产网络和获得跨国公司订单的必备条件之一。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跨国公司推动着中国制造业的新一轮空间重构和“逐底竞争”。

综上所述,全球化力量从两方面重构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一方面,全球化力量为中国企业带来了新的知识和技术,提供了一种升级的渠道和机会,为中国企业应对当前发展困境指明了一条道路;另一方面,全球化力量重塑着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地理格局,尤其是中国企业在跨国公司压力下向

中国内陆地区及其他低生产成本国家迁移的过程,推动了中国产业空间的再布局以及全球尺度上新一轮的“逐底竞争”,即全球化力量在第二轮产业重构中还扮演着离心力的角色,推动中国制造业生产离开沿海地区原有的生产基地,重新找寻更廉价的区位。

### 3.2.2 地方化

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地区差异的消失和地方发展的趋同,地方性对于企业的学习和创新至关重要(Cammett, 2006)。即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集聚仍然带有明显的地方特征,地方化对于中国产业重构也很重要。在地方产业集聚中,经济主体之间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产生的制度厚度(Amin et al, 1994)、企业嵌入性(Granovetter, 1985)、贸易或非贸易依赖关系(Storper, 1997)等对企业竞争力和产业升级至关重要。目前,制造业的生产活动和就业市场大部分集中于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沿海区域的产业集聚区,因此地方化力量更加重要(Fujita et al, 2001; Wen, 2004; He et al, 2008)。企业可以从当地的劳动市场、知识溢出、公司协同效应中获益,即嵌入在区域集群中,因此不愿意轻易离开其所在区域及产业集群。亦即是地方社会和生产网络提供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商的负面影响,缓和了“完全”产业转移的紧迫性(Zhu et al, 2013; Zhu, He, et al, 2014; Zhu et al, 2015)。因此,地方化力量在产业重构过程中起到向心力作用,企业的地方嵌入性使得企业很少彻底离开原有区位及产业集群。一方面,在全球化(离心力)的影响下,企业选择将低附加值、低端、低技术的生产转移至生产成本较低的中国内陆省份或者其他国家,即去地方化;另一方面,在地方化(向心力)的作用下,企业通常将对生产成本不太敏感的高端生产环节保留在沿海区域并利用地方化力量推动产业升级,最终形成了“局部”产业转移现象。“局部”产业转移使得企业可以继续从原有区位尤其是产业集群中获取升级所需的动力(Li et al, 2012; Li, 2014),同时可以从新生产区位获得成本优势(Azmeh et al, 2013; Butollo, 2014, 2015)。中国第二轮产业重构的复杂性正体现在全球化和地方化共同作用下的产业“局部”转移和产业升级的共存和相互作用格局。

### 3.2.3 区域化

地理邻近产生的优势不仅来源于地方社会网

络和制度环境,也体现在区域化力量的作用,尤其是区域生产网络形成对产业重构的影响(Abernathy et al, 2006; Pickles et al, 2006; Tokatli, 2008)。目前,市场需求快速变动,企业的成败愈发取决于其能否做到市场期望的快速补货和快速响应,尤其是在一些时效性较强的产品上(Tewari, 2006; Smith et al, 2014)。因此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日益重视区域生产体系的打造,以更好实现弹性生产、快速响应和精益生产。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转移过程中,更加青睐邻近省份的低成本区域,以缩短供应链长度,降低物流成本,提升反应速度(Yang, 2013; Yang, 2014a; Butollo, 2015)。尽管在特定情况下,某些企业选择转移或外包到国外,但他们仍然重视平衡成本降低带来的收益和供应链拉长带来的成本上升。这种在区域尺度上形成的生产体系即区域生产网络。区域化力量同样扮演向心力作用,和地方化力量相同的是两者都会加强地理邻近的作用,与地方化力量不同的则是区域化力量发生在区域尺度上的区域生产网络内部,而非更小的地方尺度上的产业集群内部。

目前的大部分研究聚焦于全球化、区域化和地方化中的单一过程,较少关注三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一些特例如:Wei(2010)强调,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重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需要一方面需从新区域主义视角向上抬升尺度,另一方面要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向下降低尺度。同时,也有研究基于中国产业再布局构建了检验全球化、区域化和地方化相互作用的研究框架,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和再布局的程度,阐述了不同区域的生产地理形态和发展轨迹(贺灿飞等, 2011; Zhu et al, 2013)。

总而言之,全球化力量除了利于产业升级之外,同时还推动制造业生产不断进行“逐底竞争”,转移到更低成本的生产区位。但是很少有企业彻底离开其原有区位,因为地方化力量的存在,而后者反映了制造业企业的地方嵌入性和黏着性。在地方化和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企业通常选择将低端生产转移至生产成本较低区域,同时将对生产成本不太敏感的高端环节留在沿海区域并利用地方化力量迅速升级。换句话说,全球化和地方化力量都在推动产业升级,全球化还起到离心力作用,推动去地方化,并与地方化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局部”产业转移的复杂空间结构变化。最后,区域生产网



络、及时生产、快速反应等新生产体系和商业模式的崛起进一步推动了区域化的进程,使得原有的“局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并存的现象更加复杂(图2)。全球化、区域化和地方化的相互作用促进了以“走出去、走上去、向西走”为特点的第二轮产业重构的发生。

### 3.3 中国“新”经济地理格局相关研究的理论贡献

中国的第二轮产业重构,不单单验证了诸如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产业转移、产业集群、区域生产网络等西方经典理论,同时还提供了新的实证和理论贡献,是国际经济地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板块。

#### 3.3.1 制度、政策与法规

与西方市场经济下产业重构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不同地区的制度环境与政策法规不同,因此对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也不相同(Wei, 2009; Lin et al, 2011; Chen, 2014; Yang, 2014b; Zhu et al, 2015)。为此在分析中国第二轮产业重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不同尺度、不同区域制度环境的差异,而不应简单地将中国视为均质化的制度空间。

中央政府通过实施经济政策和相关法规在产业升级与再布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Liu et al, 2006; Wei, 2009; Zhu, Pickles, 2014),如国家产业政策、金融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劳动法规和环境法规及其执行力度都会影响企业的组织变化和空间行为(万薇等, 2012; 葛秋萍, 2013; Yang, 2014b; 贺俊, 2014; Lan et al, 2015; 程俊杰, 2015; 孙早等, 2015; 彭俞超等, 2016)。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占比逐渐增大,国有经济比重下降,但是

一方面国有企业仍然活跃在运输设备和电子制造等关键战略产业(Liu et al, 2006; Yang, 2014b; Zhu, Pickles, 2014; 刘志高等, 2016);另一方面国家仍然通过实施“走出去、走上去和向西走”三类产业和经济政策,直接驱动第二轮制造业产业重构(Zhu, Pickles, 2014)。

另外,地方政府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尤其在地方分权化之后,地方政府通过规划、开发、地方政策等手段直接参与地方经济(Wei, 2010)。为了刺激区域发展,地方政府会出台目标明确的经济政策以培养创新精神与企业家精神,引导产业重构(Zhu, He, et al, 2014)。因此,即使国家统一实施的产业政策,但不同区域的具体制度环境不同,导致同一产业在不同地方的产业升级路径具有明显差异(叶选挺等, 2015)。如近年中央政府的考核目标从“偏增长”向“重转型”转移,但是地方政府依然会在短期经济增长的效益与经济转型之间作出取舍(孙早等, 2015),并出台相应的赋税、贸易保护、补贴等产业政策(程俊杰, 2015)。Zhu、He(2013)以宁波服装业集群和永康五金器具生产集群为对象,研究地方政府不同行为对企业嵌入性的影响,验证了地方政府在第二轮产业重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3.3.2 国内市场和企业的能动性

中国制造业重构的特殊之处还源自于其特有的、庞大的国内市场。虽然中国制造业企业大部分以出口为导向,但是随着近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因此部分企业开始以国内市场为导向进行转型发展。最新研究重点关注2000年后的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及相应的生产网络,并探究了国内市场对产业升级和再布局的影响(Yang, 2013; Yang, 2014a; Butollo, 2015; Zhu et al, 2015)。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中国制造业企业通常是跨国公司的供货商,承担制造装配等低端生产环节,如今中国制造业企业转向国内市场,将很容易从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攀升到高附加值的设计、品牌推广和销售等环节,提升自身竞争力(Butollo, 2015; Zhu et al, 2015)。与此相反,部分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没有很好地利用中国国内市场的巨大优势,则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生产环节,很难实现功能升级,因此实施从国际市场“去耦合”并在国内市场“再耦合”的策略对企业升级至关重要(Yang, 2014a)。与国内市场的“再耦合”同时推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向内陆转移,以利于企业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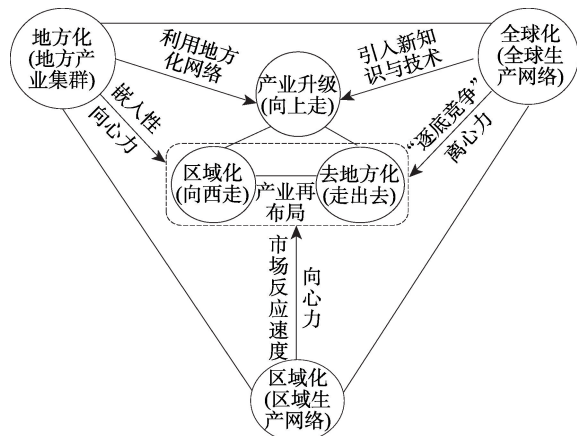


图2 全球化、区域化与地方化

Fig.2 Globalization, reg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好地入驻中国中西部广阔的国内市场(Zhu et al, 2013)。总之,中国制造业企业可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进行产业升级与再布局,提升重返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中国制造业企业不仅主动与国内市场再耦合,而且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强烈的主观能动性(Zhu et al, 2015)。Li等(2012)的研究表明,在低技术含量的行业,地方制造商目标明确的集体行动可创造新的产业升级路径和发展轨迹。在电子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产业集群中的大部分制造商也可通过集体研发提升核心技术(Wang et al, 2010)。总之,围绕国内市场形成的新生产网络、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自身主观能动性和主动创新共同影响着产业升级和产业再布局(Zhu et al, 2015)。

### 3.3.3 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为深入理解第二轮产业重构的内在机制,部分学者借鉴演化经济地理分析框架,剖析中国区域经济和产业集群的变化和兴衰(Li et al, 2012; Yang, 2012; Yang, 2013; Yang, 2014a; Guo et al, 2015),在中国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出现了“演化转向”(刘志高等, 2006; 刘志高等, 2008)。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一个区域的经济的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未来的走向受到历史路径的影响(Grabher, 1993; Martin et al, 2006),强调时空情境的特定性和动态的变化过程(刘志高等, 2011)。演化经济地理学进一步提出,一个区域的早期优势条件,包括产业发展环境、高度发达的专业化基础设施、公司间的联系、区域制度和政策支持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变成创新的障碍,导致产业活动模式逐渐固化,形成了制约区域持续发展的负向路径依赖,对产业重构产生障碍(Grabher, 1993; Hassink et al, 2005; Martin et al, 2006; Henning et al, 2013)。Martin等(2006)总结了克服这种障碍的四种策略,包括技术发展、创新、升级和再布局。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对原有的如产业集群、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等经典理论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尤其是其对动态视角的强调(MacKinnon et al, 2009; MacKinnon, 2012)。

经济地理学者对中国产业集群创新能力提升及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进行了深入研究(刘志高等, 2011; 黄群慧等, 2015; 刘志高等, 2016)。在中国,区域产业重构过程同样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Guo et al, 2015)。虽然外部环境、发展机遇、企业家精神和政府集体创新等多种因素会导致或强化

企业的路径依赖发展模式,但这些因素也可能会诱发突破性创新,从而产生路径打破式发展(刘志高等, 2011)。由此可见,强化路径依赖的因素可能演变为突破路径依赖的因素,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此外,当地制造业企业的自身发展战略和创新也能改变产业集群的演化方向(Li, 2012)。中国的一些地区由于成功克服了路径依赖,通过产业升级提高了生产效率(刘志高等, 2011; Guo et al, 2015)。

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再耦合和去耦合理论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动态的视角,也被应用于中国产业重构研究。Yang(2013)基于Mackinnon(2012)的理论框架,将演化经济地理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结合起来,指出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可通过对全球生产网络的耦合、去耦合和再耦合实现更好的产业升级和空间重构,提升自身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总体而言,中国演化经济地理学者的研究指出,在中国制造业的第二轮产业重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制度变迁、外生力量和内生力量共同影响产业结构的演化。

## 4 讨论

表1展示了“旧”和“新”经济地理格局相关研究的差异。“旧”经济地理格局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分权化、全球化共同作用下,中国的制度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破碎化、动态化、多元化的制度景观,对中国该阶段产业格局影响深刻。其实,中国的经济地理学者在积极引入西方经典产业地理集聚和分散的相关理论的同时,就指出这些理论是基于市场经济主导的西方国家的经验。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其独特性,尤其在其特有的转型期制度环境对产业集聚和分散的巨大影响。因此,中国的研究同时挑战了西方经典理论,并通过引入制度视角,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现有西方理论。

“新”经济地理格局的到来大约发生在21世纪初,随着中国廉价劳动力和人口红利优势的减弱、外部对中国出口需求的下降、中国环境和劳动保护法规的提升,以沿海低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集群和集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受到挑战。此阶段中国经济地理的相关研究也愈发多元,开始引入更多样的理论来研究中国产业的第二次重构,如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区域生产网络、产业集群、产



表1 产业重构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地理研究转向

Tab.1 Shifts in China's economic geography studies in an era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旧”经济地理格局		“新”经济地理格局
时间阶段	改革开放后至2005年左右	2005年左右至今
诱发因素	改革开放	人口红利消失和劳动力成本上升 土地、资源等其他要素成本上升 金融危机之后外部需求下降 国内环境和劳动保护規制加强
重点研究视角和理论	产业集群和产业集聚理论 制度地理学	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 产业集聚和产业集聚 区域生产网络 演化经济地理 制度地理学 产业升级和转移相关理论
内部机制现象	市场化、分权化、全球化 产业集聚和分散	全球化、区域化、地方化 产业升级(向上走) 区域化(向西走) 去地方化(走出去)
重要贡献	突出中国破碎化、动态化、多元化的制度环境对产业格局的影响,挑战和丰富了传统的基于“西方经验”的产业地理集聚和集群理论	一方面,中国制造业重构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整合现有不同经典理论的场景,使得经济地理学能更好地挖掘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演化经济地理、产业集群等理论的交叉领域;另一方面,该类研究不仅采用了西方经典经济地理学理论,而且关注国家干预、政策力量、本国市场的重要性、地方企业能动性等因素,弥补了现有西方经典理论的缺陷。
代表作	Fujita et al(2001), Wei(2001), Bai et al(2004), He et al(2008),金煜等(2006),贺灿飞等(2007),王缉慈等(2007),贺灿飞等(2010)	Wei(2010), Liao et al(2011), Zhu et al(2013), Zhu et al(2014), 吴三忙等(2010),刘志高等(2014),刘志高等(2016)

业升级和转移、演化经济地理等先进的经济地理理论纷纷被学者们用于审视中国产业在全球化、区域化、地方化三个主要机制的作用下,表现出的产业升级(向上走)、区域化(向西走)、去地方化(走出去)等新现象。相关研究对经济地理学科的理论 and 实证贡献也逐渐增大。一方面,中国制造业重构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地整合现有不同经典理论的平台,使得经济地理学能够更好地挖掘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演化经济地理、产业集群等理论的交叉领域;另一方面,该类研究不仅采用了西方经典经济地理学理论,而且关注国家干预、政策力量、本国市场的重要性、地方企业能动性等因素,弥补了现有西方经典理论的缺陷。

总之,两个阶段的相关研究都为经济地理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挑战和丰富了基于“西方经验”的经典地理学理论,发出了中国“声音”。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主要是由于第一阶段的某些机制影响减弱,如市场化及其涵盖的国企改革和非公有经济崛起等在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巨大,极大地重塑了原有的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的制度格局,但是在21世纪其影响已经弱化;分权化的力量主要指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土地政策、人才引

进政策等干预产业格局的现象,在第二阶段的分析框架中(图2)则蕴含在地方化力量之中。但是,第二阶段的崛起和新理论的应用,并不表示第一阶段的研究退出历史舞台。相反,今天众多学者运用第二阶段的分析框架剖析中国的产业转移和升级,也有部分学者仍在通过第一阶段分析框架审视中国的产业集聚和分散,如关注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垄断领域的改革等背景下的产业格局变迁。因此,两类研究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共同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

5 结论

本文对中国制造业的经济转型、制度变迁和产业重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第一部分阐释了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首轮产业重构及由此形成的“旧”经济地理格局,第二部分着重探讨了2000年以后中国制造业地理变迁的“新”经济地理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主要立足于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同时强调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国际研究和经济地理学等不同框架的有机结合,更利于了解中国产业重构的经济、政策和制度背景。

对于制造业首轮产业重构及其经济地理格局,众多文献论述了改革开放引致的制度变迁和相应的产业重构。其中,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的三重过程共同塑造了中国的制度环境,并引起经济地理格局的时空变化。相关研究引入并挑战了西方经典理论,并透过制度视角,进一步丰富和延展了现有西方经典理论。虽然中国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通过成为跨国公司供应商的形式融入全球经济并迅速实现产业升级。但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制造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日益增大,原有出口导向、劳动密集、低端发展模式的内外问题日益暴露,促进了第二轮产业重构。针对第二次产业重构,现有研究主要从全球化、区域化和地方化等不同机制解释中国制造业企业向上走、向西走和走出去的复杂场景。该类研究不仅采用了西方经典经济地理学理论,如产业集群、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区域生产网络、产业升级、产业转移、产业演化等研究中国当前的产业重构,同时关注国家干预、政策力量、本国市场的重要性、地方企业能动性等因素,一方面弥补了现有西方经典理论的缺陷,同时为当前中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可行的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中国产业重构的命题仍有很大研究潜力。首先,中国制造业重构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地整合现有不同经典理论的平台,使得经济地理学能更好地挖掘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演化经济地理、产业集群等理论的交叉领域,形成更加完整、系统的理论构建。其次,以中国为背景的实证研究不应局限于案例分析,要更重视相关研究方法的普适性。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现现有理论的缺陷,并进行弥补与充实,尤其是现有西方理论在政府干预、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的平衡、企业和政府的互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互动等方面的重视不够。通过深入研究,可不断丰富原有的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演化经济地理与产业集群等经典理论和研究范式。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曹执令, 杨婧. 2013. 中国制造业环境污染水平测算与变化态势分析[J]. 经济地理, 33(4): 107-113. [Cao Z L, Yang J. 2013. Manufacturing level estimation and trend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33(4): 107-113.]

岑丽君. 2015. 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分工与贸易地位:

基于 tiva 数据与 gvc 指数的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1): 3-13. [Cen L J. 2015. China's division of labor and trade status in GPNs: A research based on TiVA data and GVC index[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1): 3-13.]

陈曦, 席强敏, 李国平. 2015. 城镇化水平与制造业空间分布: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地理科学, 35(3): 259-267. [Chen X, Xi Q M, Li G P. 2015. Urbanization leve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5(3): 259-267.]

程俊杰. 2015. 中国转型时期产业政策与产能过剩: 基于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财经研究, 41(8): 131-144. [Cheng J J. 2015.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and excess capacity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manufacturing[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41(8): 131-144.]

葛秋萍, 李梅. 2013. 我国创新驱动型产业升级政策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30(16): 102-106. [Ge Q P, Li M. 2013. Woguo chuangxin qudongxing chanye shengji zhengce yanjiu[J].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30(16): 102-106.]

贺灿飞, 潘峰华. 2011.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成因与趋势[J]. 南方经济, 29(6): 38-52. [He C F, Pan F H. 2011. The trends of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 China and the explanations[J]. South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29(6): 38-52.]

贺灿飞, 潘峰华, 孙蕾. 2007. 中国制造业的地理集聚与形成机制[J]. 地理学报, 62(12): 1253-1264. [He C F, Pan F H, Sun L. 2007.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2(12): 1253-1264.]

贺灿飞, 朱彦刚, 朱晟君. 2010. 产业特性、区域特征与中国制造业省区集聚[J]. 地理学报, 65(10): 1218-1228. [He C F, Zhu Y G, Zhu S J. 2010. Industrial attributes, provin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5(10): 1218-1228.]

贺俊. 2014. 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产业升级: “产业政策与创新”两岸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J]. 中国工业经济, (9): 91-96. [He J. 2014.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y upgrading: Summary of China mainland & Taiwan symposium on industry policy and innovation[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9): 91-96.]

胡宗义, 刘亦文. 2010.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制造业影响的动态 CGE 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1): 19-36. [Hu Z Y, Liu Y W. 2010. A dynamic CGE study in the impact of RMB appreciation on China's manufacturing[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11):

- 19-36.]
- 黄群慧, 贺俊. 2015. 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 兼评《中国制造2025》[J]. 中国工业经济, (6): 5-17. [Huang Q H, He J. 2015. The core capability, function and strategy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omment on "Chinese manufacturing 2025"[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6): 5-17.]
- 贾国雄. 2014. 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8): 206-210. [Jia G X. 2014. Lun gaigekaifang qianhou liangge 30nian Zhongguo jingji fazhan de neizai lianxi[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8): 206-210.]
- 蒋涛, 李九全, 沈正平. 20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特征趋势: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成因的一种解释[J]. 学习与实践, (12): 26-31. [Jiang T, Li J Q, Shen Z P. 2007. Gaigekaifang yilai woguo chanye huodong de kongjian fenbu jiqi bianhua tezheng qushi: Woguo quyu jingji fazhan chayi chengyin de yizhong jieshi [J]. Study and Practice, (12): 26-31.]
- 金煜, 陈钊, 陆铭. 2006. 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 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J]. 经济研究, (4): 79-89. [Jin Y, Chen Z, Lu M. 2006.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olicy[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 79-89.]
- 李新功. 2017. 人民币升值与我国制造业升级实证研究[J]. 中国软科学, (5): 38-46. [Li X G. 2017. An empirical study on RMB appreciation and China's manufacturing upgrading[J]. China Soft Science, (5): 38-46.]
- 林桂军, 何武. 2015. 全球价值链下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增长特征[J]. 国际贸易问题, (6): 3-24. [Lin G J, He W. 2015. Growth patterns of China'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global value chai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6): 3-24.]
- 刘明, 赵彦云. 2018. 基于投入要素的中国制造业省域空间溢出效应: 测度与实证[J]. 数理统计与管理, 37(1): 122-134. [Liu M, Zhao Y Y. 2018. Measurement and empirical study of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input factors[J].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and Management, 37(1): 122-134.]
- 刘乃全, 刘学华, 赵丽岗. 2008.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的演变: 基于改革开放30年时序变动的特征分析[J]. 财经研究, 34(11): 76-87. [Liu N Q, Liu X H, Zhao L G. 2008.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structure in China since 1978[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34(11): 76-87.]
- 刘仕国, 吴海英, 马涛, 等. 2015. 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产业升级[J]. 国际经济评论, (1): 64-84. [Liu S G, Wu H Y, Ma T, et al. 2015. Use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o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 64-84.]
- 刘志高, 崔岳春. 2008. 演化经济地理学: 21世纪的经济地理学[J]. 社会科学战线, (6): 65-75. [Liu Z G, Cui Y C. 2008. Yanhua jingji dilixue: 21 shiji de jingji dilixue[J]. Social Science Front, (6): 65-75.]
- 刘志高, 王琛, 李二玲, 等. 2014. 中国经济地理研究进展[J]. 地理学报, 69(10): 1449-1458. [Liu Z G, Wang C, Li E L, et al. 2014. Research progress of economic geography i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9(10): 1449-1458.]
- 刘志高, 尹贻梅. 2006. 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关系的历史考察[J]. 经济地理, 26(3): 353-358. [Liu Z G, Yin Y M. 2006.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histor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economics[J]. Economic geography, 26(3): 353-358.]
- 刘志高, 尹贻梅, 孙静. 2011. 产业集群形成的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评述[J]. 地理科学进展, 30(6): 652-657. [Liu Z G, Yin Y M, Sun J. 2011.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industrial cluster 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0(6): 652-657.]
- 刘志高, 张薇. 2016.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产业结构演变与分叉研究评述[J]. 经济地理, 36(12): 218-223. [Liu Z G, Zhang W. 2016. Review on stud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bran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J]. Economic Geography, 36(12): 218-223.]
- 罗胤晨, 谷人旭. 2014. 1980-2011年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及其演变趋势[J]. 经济地理, 34(7): 82-89. [Luo Y C, Gu R X. 2014. The agglomeration pattern and its evolution tendency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etween 1980 and 2011[J]. Economic Geography, 34(7): 82-89.]
- 吕卫国, 陈雯. 2012. 产业集聚向心力和扩散离心力的变化过程: 以改革开放以来苏锡常地区制造业聚散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1(8): 911-917. [Lü W G, Chen W. 2012. Dynamic of the centripetal force and the centrifugal force in the progress of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1(8): 911-917.]
- 聂飞, 刘海云. 201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制造业转移: 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家, (7): 35-44. [Nie F, Liu H Y. 2015. China's outward FDI and the transfer of domestic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ubin Model for dynamic space[J]. Economist, (7): 35-44.]



- 彭俞超, 方意. 2016. 结构性货币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稳定[J]. 经济研究, (7): 29-42. [Peng Y C, Fang Y. 2016.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and economic stability[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7): 29-42.]
- 邱斌, 叶龙凤, 孙少勤. 2012.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出口复杂度的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1): 57-67. [Qiu B, Ye L F, Sun S Q. 2012.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GPNs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SI[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1): 57-67.]
- 盛斌, 陈帅. 2015. 全球价值链如何改变了贸易政策: 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和启示[J]. 国际经济评论, (1): 85-97. [Sheng B, Chen S. 2015. How has the global value chain changed trade policy: Impacted and implications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 85-97.]
- 孙早, 席建成. 2015. 中国式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 产业升级还是短期经济增长[J]. 中国工业经济, (7): 52-67. [Sun Z, Xi J C. 2015.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China: Industrial upgrade or short-term economic growth[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7): 52-67.]
- 唐海燕. 2013. 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变迁[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5): 1-9, 151. [Tang H Y. 2013.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le of China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J].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 1-9, 151.]
- 田川. 2009.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发展走势分析[J]. 改革与开放, (6): 61. [Tian C. 2009. Gaigekai fang 30 nian woguo jingji fazhan zoushi fenxi[J]. Reform & Opening, (6): 61.]
- 万薇, 张世秋. 2012. 利用环境政策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基于深圳pcb行业的排污权交易制度设计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48(3): 491-499. [Wan W, Zhang S Q. 2012. Can Emission Trading Policy Help Restructuring Industry? A case study in Shenzhen of China[J].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48(3): 491-499.]
- 王缉慈, 林涛. 2007. 我国外向型制造业集群发展和研究的新视角[J].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43(6): 839-846. [Wang J C, Lin T. 2007. New insights to China's export-oriented clusters[J].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43(6): 839-846.]
- 吴三忙, 李善同. 2010. 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分析[J]. 中国软科学, (6): 123-131. [Wu S M, Li S T. 2010. An analysi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J]. Journ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6): 123-131.]
- 吴彦艳, 赵国杰, 丁志卿. 200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回顾与展望[J]. 经济体制改革, 2008(6): 13-16. [Wu Y Y, Zhao G J, Ding Z Q. 2008. Gaigekai fang yilai woguo liyong waizi zhengce de huigu yu zhanwang[J].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6): 13-16.]
- 许德友. 2011. 对外贸易与产业地理[D]. 南京: 南京大学. [Xu D Y. 2011. Foreign trade and industrial geography[D]. Nanjing, China: Nanjing University.]
- 许德友, 梁琦. 2011. 对外贸易与国内产业地理: 来自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综述[J]. 南方经济, 29(11): 63-73. [Xu D Y, Liang Q. 2011. Foreign trade and industrial geography: A review from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J]. South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29(11): 63-73.]
- 阳立高, 龚世豪, 韩峰. 2015. 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和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实证[J]. 中国软科学, (11): 136-144. [Yang L G, Gong S H, Han F. 2015.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the change in new generation labors supply on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new generation labors supply and sub-sector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J]. China Soft Science, (11): 136-144.]
- 阳立高, 谢锐, 贺正楚, 等. 2014.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软科学, (12): 136-147. [Yang L G, Xie R, He Z C, et al. 2014.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rising labor cost on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upgrad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sub-sector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J]. China Soft Science, (12): 136-147.]
- 姚志毅, 张亚斌. 2011. 全球生产网络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J]. 南开经济研究(6): 55-65. [Yao Z Y, Zhang Y B. 2011. Measure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under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J]. Nankai Economic Studies, (6): 55-65.]
- 叶选挺, 李明华. 2015. 中国产业政策差异的文献量化研究: 以半导体照明产业为例[J]. 公共管理学报, (2): 145-160. [Ye X T, Li M H. 2015. Study on the difference of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olicy document: A case study on the light emitting diode industry[J].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 145-160.]
- 尹翔硕. 1997. 中国出口制成品结构与制造业生产结构差异的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4): 6-12. [Yin X S. 1997. Zhongguo chukou zhichengpin jiegou yu zhizaoye shengchan jiegou chayi de fenxi[J].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4): 6-12.]
- 原媛, 李国平, 孙铁山, 等. 2015. 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大类的区域转移特征与聚类研究[J]. 经济地理, 35(10): 94-102.

- [Yuan Y, Li G P, Sun T S, et al. 2015. Research on regional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and clustering of major industries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data of 2001 and 2009[J]. *Economic Geography*, 35(10): 94-102.]
- 张鹏, 王娟. 2016. 全球生产网络中国产业升级结构封锁效应及突破[J]. *科学学研究*, 34(4): 520-527. [Zhang P, Wang J. 2016. Structural blocking effect of China's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global industri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the breakthrough way[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34(4): 520-527.]
- 张韵君, 孟祺. 2009.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升级探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4): 8-12. [Zhang Y J, Meng Q. 2009. Jinrong weiji beijingxia woguo zhizaoye shengji tanxi[J]. *Forum of World Economics & Politics*, (4): 8-12.]
- 邹昭晞. 2010. 我国制造业的低端产业举证及其困境摆脱[J]. *改革*, (8): 58-68. [Zou Z X. 2010. The evidence of the low end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getting rid of the difficulties[J]. *Reform*, (8): 58-68.]
- Abernathy F H, Volpe A, Weil D. 2006. The future of the apparel and textile industries: Prospects and choices for public and private actor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12): 2207-2232.
- Amin A, Thrift N. 1994.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Europe*[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zmeh S, Nadvi K. 2013. 'Greater Chines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rise of the Jordanian garment industry[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4(6): 1317-1340.
- Bai C E, Du Y, Tao Z, et al. 2004.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indust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3(2): 397-417.
- Butollo F. 2014. The end of cheap labou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upgrading" in China[M].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Campus Verlag.
- Butollo F. 2015. Growing against the Odds: Government agency and strategic recoupling as sources of competitiveness in the garment industr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8(3): 521-536.
- Cammett M. 2006.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global productio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local clusters in apparel manufacturing[J]. *Competition & Change*, 10(1): 23-48.
- Chang W, MacMillan I C. 1991. A review of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6(6): 375-379.
- Chen L. 2014. Varieties of global capital and the paradox of local upgrading in China[J]. *Politics & Society*, 42(2): 223-252.
- Coe N M. 2011. Geographies of production II: A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Z[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6(3): 389-402.
- Coe N M, Dicken P, Hess M. 2008.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alizing the potential[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8(3): 271-295.
- Evans Y, Smith A. 2006. Surviving at the margins? Deindustrialisatio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upgrading in London's garment sector[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12): 2253-2269.
- Fujita M, Hu D. 2001.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1985-1994: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35(1): 3-37.
- Gereffi G. 2009. Development model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and Mexico[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1): 37-51.
- Gereffi G, Humphrey J, Sturgeon T. 2005.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2(1): 78-104.
- Grabher G. 1993. The weakness of strong ties: The lock-i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Ruhr area[M]//Grabher G. In *the embedded firm: On the socioeconomics of industrial networks*. London, UK: Routledge: 255-277.
-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481-510.
- Guo Q, He C. 2015. Production space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evolution in China[J]. *GeoJournal*, 80(6): 1-18.
- Hassink R, Shin D H. 2005. The restructuring of old industrial areas in Europe and Asi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7(4): 571-580.
- He C, Pan F, Chen T. 2016. Research progress of industrial geography in china[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6(8): 1057-1066.
- He C, Wei Y H D, Xie X. 2008.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in China[J]. *Regional Studies*, 42(7): 923-945.
- Head K, Ries J. 1996. Inter-city competition for foreign investment: Static and dynamic effects of China's incentive area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0(1): 38-60.
- Henderson J, Nadvi K. 2011. Greater China,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dynamics of transfor-

- mation[J]. *Global Networks*, 11(3): 285-297.
- Henning M, Stam E, Wenting R. 2013. Path dependence research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acophony or knowledge accumulation[J]. *Regional Studies*, 47(8): 1348-1362.
- Lan T, Pickles J, Zhu S. 2015. State regulation, economic reform and worker rights: The contingent effects of China's labour contract law[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5(2): 266-293.
- Li P F. 2014. Horizontal versus vertical learning: Divergence and diversification of lead firms in the Hangji toothbrush cluster, China[J]. *Regional Studies*, 48(7): 1227-1241.
- Li P F, Bathelt H, Wang J. 2012. Network dynamics and cluster evolution: Changing trajectories of the aluminium extrusion industry in Dali, China[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2(1): 127-155.
- Liao H, Chan R K. 2011. Industrial relocation of Hong Kong manufacturing firms: Towards an expanding industrial space beyond the Pearl River Delta[J]. *GeoJournal*, 76(6): 623-639.
- Lin H L, Li H Y, Yang C H. 2011. Agglomeration and productivity: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s textile industry[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2(3): 313-329.
- Liu W, Dicken P. 2006.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bligated embeddednes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r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7): 1229-1247.
- Ma L J C, Wei Y. 1997. Determinants of state investment in China, 1953-1990[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88(3): 211-225.
- MacKinnon D. 2012. Beyond strategic coupling: Reassessing the firm-region nexus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2(1): 227-245.
- MacKinnon D, Cumbers A, Pike A, et al. 2009. Evolu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Institutions, political economy, and adapt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85(2): 129-150.
- Martin R, Sunley P. 2006. 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6(4): 395-437.
- McMillan J, Naughton B. 1992. How to reform a planned economy: Lessons from China[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8(1): 130-143.
-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ickles J, Smith A, Buček M, et al. 2006. Upgrading, changing competitive pressures, and diverse practices in the east and central European apparel industr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12): 2305-2324.
- Scott A. 2006. The changing global geography of low-technology, labour-intensive industry: Clothing, footwear, and furniture[J]. *World Development*, 34(9): 1517-1536.
- Smith A, Pickles J, Buček M, et al. 201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gional industrial change and differential upgrading in the East European clothing industr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4(6): 1023-1051.
- Storper M. 1997. The regional worl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Tewari M. 2006. Adjustment in India's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y: Reworking historical legacies in a post-MFA world[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12): 2325-2344.
- Tokatli N. 2008. Global sourcing: insights from the global clothing industry: The case of Zara, a fast fashion retailer[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8(1): 21-38.
- Wang C, Lin G C S, Li G. 2010. Industrial clustering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the ICT industry in Shenzhen[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2(8): 1987-2010.
- Wei Y H D. 2000.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States,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M]. London, UK: Routledge.
- Wei Y H D. 2001. Decentral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triple processes underly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J]. *Asian Geographer*, 20(1-2): 7-23.
- Wei Y H D. 2009. China's shoe manufacturing and the Wenzhou Model: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s leading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footwear[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0(6): 720-739.
- Wei Y H D. 2010. Beyond new regionalism, beyo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making the Sunan model, Chin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28(1): 72-96.
- Wen M. 2004. Relocat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Chinese industr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3(1): 329-347.
- Yang C. 2012. Restructuring the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emerging tension[J]. *Applied Geography*, 32(1): 143-157.
- Yang C. 2013. From strategic coupling to recoupling and decoupling: restructuring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regional evolution in China[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1(7): 1046-1063.
- Yang C. 2014a. Market rebalancing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globalizing era:



- Transformation of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1(1): 130-156.
- Yang C. 2014b. State-l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domestic firms in Shenzhen, China: Evidence from 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 industry[J]. *Cities*, 38(6): 1-10.
- Zhao X B, Zhang L. 1999. Decentralization reforms and regionalism in China: A review[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2(3): 251-281.
- Zhu S, He C. 2013. Geographical dynamics and industrial relocation: Spatial strategies of apparel firms in Ningbo, China [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4(3): 342-362.
- Zhu S, He C, Liu Y. 2014. Going green or going awa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firms' strategies in China's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J]. *Geoforum*, 55(8): 53-65.
- Zhu S, Pickles J. 2014. Bring in, go up, go west, go out: Upgrading, regionalisation and delocalisation in China's apparel production networks[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4(1): 36-63.
- Zhu S, Pickles J. 2015. Turkishization of a Chinese apparel firm: fast fashion, regionalisation and the shift from global supplier to new end markets[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8(3): 537-553.

## Shifts in China's economic geography studies in an era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ZHU Shengjun, WANG Chong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characterized by the tripl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enabled it to emerge rapidly as a global supplier particularly of the low-end,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resulting in enormous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of the economic landscape. However, since the early 2000s, the "race to the bottom" that typified the "China price" and the model of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has been challenged by various factors, which triggered another round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produced new economic geographies of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review of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geographical and industrial dynamic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y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wo strands of literature. One strand examines China's "old" economic geographies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while the other strand builds on recent insights in economic geography on industrial clustering, global and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upgrading, relocation, and national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evolution, and takes into account the role of state actions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s, the rise of China's domestic market, the role of local agents, and other factors that have been often overlooked in tradition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literature.

**Key words:**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pattern of economic geography; China